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意涵特征、时代诉求及建构路径

卜宏波^{1,2,3},王树明¹

摘要:基于学校民俗体育实践案例的启示,依据场域理论,提出构建“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意指跨越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地域的文化情境与时空界限,关系主体在合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规则的指引下进行民俗体育文化实践而构建的关系构型。具体而言,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以民俗体育活动为载体的实践场,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精神场,是以校地互动发展为定向的交际场。根据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实践探索所形成的经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必然要求,提出建构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主要路径:加强民俗体育文化宣传创新,提高参与意识与能力;优化民俗体育教学文化场,强化文化育人;拓展民俗体育课外活动文化场,增加交流与体验;深化多元互动机制,注重关系主体“在场性”。

关键词:民俗体育;学校体育;校地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自信;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26)06-0048-09

DOI:10.15942/j.jcsu.2024.06.29

民族的复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支撑,文化的复兴需要以教育为先导,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党和国家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对学校、地方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主阵地之一,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学校体育的重要职责与使命^[1]。民俗体育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构成,其蕴含的“根”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精神认同的重要动力源^[2]。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俗体育活动主体大量流失,加之现代竞技体育和新兴体育项目的持续冲击,民俗体育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不断弱化,在学校体育体系中日渐边缘化,

亟待探索校地互动的文化传承新路径。

置身时代发展的洪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如何高效整合优势,构建互补、互助、互进的发展生态,是破解难题的重要突破口。诸多学者针对这一命题展开探索,充分肯定了两者联动发展的意义^[3]。然而,多数研究以单向度探索为主,较少关注不同空间文化发展共同体的构建,存在偏重活动形式与内容的简单移植,将脱离了文化母体的民俗体育按照西方式单一项目化思维改造等“异化”传承现象,致使其陷入传播与发展的困境^[4]。本研究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结合对C学校个案的反思与经验总结,运用场域的概念与思维进行探究,致力突破民俗体育的学校场与地域场的界限,综合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自身特征、功能、优势以及发展需求,强调坚持本位文化观照,以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根本,构筑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共同体,探索民俗体育在校地互动中的新发展模式。

1 学校民俗体育实践案例分析

1.1 案例基本情况

在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背景下,C学校作为一所普通高校,认真贯彻各项纲领性文件精神,根据学校体育发展规划,利用学校优势积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安徽特色民俗体育与大学体育互动发展研究”(AHS-KQ2019D064)。

第一作者简介:卜宏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体育教学心理;E-mail:40017729@qq.com。

通信作者简介:王树明,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运动心理、动作技能学习与控制;E-mail:shuming2005@hotmail.com。

作者单位:1.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2.巢湖学院体育学院,安徽巢湖238000;3.安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收稿日期:2023-04-25 **修回日期:**2025-01-02

极开展民俗体育项目。自2017年以来开设多门民俗体育课程,组建舞龙、舞狮、龙舟等民俗体育特色项目校队,广泛参加各类型竞技比赛和展演活动,并取得较好的比赛成绩和社会反响,获得学校领导、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以特色民俗体育项目服务学校体育、地方发展以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等成效显著。通过调查得知,C学校开展民俗体育时间相对较短,但发展速度和取得成效较为突出,其发展主要经历两个阶段:

一是“个域”空间的独立发展。这一阶段是C学校开展民俗体育活动的初期阶段,主要是通过招聘、培训专业教师,开设体育专业的舞龙舞狮课程,加强对相关民俗体育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师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并能够为学校运动会、体育文化节等增添展演项目,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师生主要局限于完成学校既定的教学、课外活动任务,参与群体主要为具有课程学习任务的学生,民俗体育发展的空间受限。二是“共域”空间的互动发展。为满足学校与地方发展的需求,民俗体育项目突破“个域”空间,在“共域”空间汲取发展能量,发挥服务力。一方面,在学校空间的跨区域、跨部门的互动。民俗体育作为学校各类文艺表演活动、文化节以及各项体育赛事等的常设展演节目;学校成立舞龙舞狮社团,组建舞龙舞狮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省市级等各类比赛,增加对外交流的机会;学校在推进大学体育俱乐部改革中,专门成立传统体育俱乐部,为更多的学生提供认识、体验传统体育项目的机会和平台,为促进校园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学校与地方空间的跨界互动。学校以服务地方为办学追求,就体育专业而言,注重以体育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丰富民众体育文化生活。学校舞龙舞狮项目在周边地区的民俗文化节、“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学校与当地乡镇合作组建龙舟队参加省、市级比赛;与当地文旅企业达成文艺展演合作协议,与政府部门达成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等。另外,学校聘请地方民俗体育传承人进行教学、训练等指导工作;向全校师生推介地方特色民俗体育项目,如在学校体育文化节、运动会等活动中邀请地方代表队进行展演,让更多师生认识到地方特

色体育项目,感受原汁原味的地方民俗体育文化魅力,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

1.2 案例反思与启示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得到重视,民俗体育项目在学校与地方的发展备受关注,C学校民俗体育在实践方式、成效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突破民俗体育实践“域界”的成果表明,传统的局限于学校空间的封闭式思路不利于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应当结合学校和地方发展需要,打破发展空间壁垒,加强交流合作。其优质经验可以为学校与地方民俗体育的互动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另外,通过深入审视C学校民俗体育实践发现,一些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受到西方体育文化思维模式影响,如过度强调竞技性、表演性,偏重于形式上的“热闹”,弱化和忽视其深厚的文化性、文化价值,易导致民俗体育文化本位缺失,而“悬浮”于学校文化和教育体系表层^[5]。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民俗体育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逐渐呈现颓废之态,缺乏内在文化生命机理被认为是根本原因^[6];民俗体育理论知识教育的欠缺,导致人们对民俗体育理论的无知,缺乏参与热情,极大地限制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7]。综合来看,校地打破固有的发展边界,进行积极的双向互动,对促进民俗体育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需要明晰的是,民俗体育实践由“热闹”转化成实质上的成效应当加强校地思想文化的深度互动。从民俗体育进入校园实践经验来看,为满足学校体育发展需求而进行一定的适应性改造,这使得坚持文化本位性愈发显得重要和迫切,加强校地互动则是有效的途径,如借助本源文化空间的交流、反馈,提升行动主体对民俗体育“根”文化内涵的认知深度,增强文化意识,促进优秀文化基因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表达^[8],以保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目的的有效达成。

2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意涵特征

2.1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理论意涵

学校民俗体育实践由“个域”走向“共域”是突破域界限制的体现,从学校与地域的特色与需求出发,利于校地在共商共建中助力民俗体育的推广与创新,共享发展新成果,其一定程度上是民俗体育

实践共生空间生成的映射。当前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交流与合作中存在形式上的结合样态,互动中存在融合障碍,其主要集中表现在不同体育空间运行逻辑冲突、关系僵化等。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得知,场域理论着重从事物发生之中蕴含的社会空间不同构成要素位置、不同运行规则等进行深入考察,分析社会空间内行动者的实践逻辑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9],为体育场域空间的生成思考提供了重要思路^[10],为分析学校体育、民俗体育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视角。

场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物质能量交换和相互影响、互动和作用的综合结果,无影无踪却对物质产生着巨大的作用^[11]。受物理学中磁场论的启发,布迪厄提出场域(field)的概念,对社会实践学中人与各种事物之间构成的各种社会性的关系进行阐述^[12]。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空间隐喻^[13],不同于物理空间,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4],将其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解答行动者实践空间的问题,其空间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论的超越之上,即超越了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15]。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16];另外,场域不是孤立的空间,而是在空间内部以及空间与外界不断发生关系中动态生成的空间,是一个力量的空间、斗争的空间、具有一定规则的空间。围绕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所指涉“场域”属于社会学概念,学校与地域空间的行动主体在开展相应文化实践活动中应突破物理空间结构固化、场所封闭等限制,重构一个可拓展、可交互的、动态的多维空间,即“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

学校与地域通过拓展各自构筑的相对孤立、狭隘的场域运行逻辑,打破民俗体育文化场的边界,加强交流交往交融,各行动主体能够以场域运行的共同规则、发展目标进行联系与实践,进而重构校地民俗体育共生的新型的关系网络。其利于发挥学校主体在民族文化遗产发展中的潜力,以具有“根”文化优势的民俗体育项目促进学校体育内涵

式发展,为学校体育总体目标的达成服务。同时,学校体育能够以积极的文化反哺民俗体育发展,增强人们对民俗体育文化内涵的认知、认同,提升地域民俗体育开展的信心与动力。鉴于此,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可以被理解为,跨越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的文化情境与时空界限,各关系主体在合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规则的指引下不断地进行民俗体育文化实践而构建的关系构型。

2.2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基本特征

2.2.1 以民俗体育活动为载体的实践场

民俗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是基于主体参与一定体育活动而得以实现,民俗体育项目对活动主体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以及身体技能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要求,其活动仪式、身体动作等均成为文化象征的符号,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达,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能够达到身体塑造与心灵培育的目的,进而集中体现了民俗体育活动作为实践载体的身份表征。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围绕民俗体育活动这一载体而施加影响、体现价值的实践场,通过开展各类型民俗体育活动强化场域内各行为主体间关系,并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传递,实现场域主体发展的目标。结合 C 学校民俗体育实践得知,其活动不仅包括各运动项目的教学、训练、表演、竞赛以及各节事的仪式等活动,也包括围绕民俗体育开展的理论研究、人际交往以及产业合作等多类型的拓展活动,且场域主体依据不同的发展需要进行针对性、合理化的实践,如在学校体育文化场中,民俗体育活动能够或其他体育活动共同为学生健康促进服务,传递民俗体育知识与技能,提升校园各主体对民俗体育的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以及未来社会人才的培养服务;在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场中,多样化的民俗体育活动可以助力地方生产、生活文化建设,对广大民众的健身、娱乐以及生产劳动等方面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2.2.2 以民俗体育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精神场

“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17],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就以文化作为区分“夷狄”的标志。中华民族自古以文化为族群认同的纽带,而不是以种族、血缘或地域为认同纽带^[18]。文化认同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为建立大一统国家以及

维系民族团结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和社会实践常被作为了解一种整体(异族)文化生活样态的途径,多样化的身体动作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源,人们建立在身体上的认知利于消解由于语言带来的偏见和话语性压制^[19],具有强化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在结合各地域与学校的情况,基于主体认可的民俗体育活动开展,传递民族文化精髓,能够以民俗体育文化认同维系各主体的良性关系,增添主体实践的动力,如发挥民俗体育文化服务学校育人、各地域人民生活、生产等积极作用的实践场域。其突破传统文化空间壁垒,构建校地文化发展共同体,为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优越条件,为主体提供更多了解、学习以及练习民俗体育项目的机会,为文化传授奠定知识与技能的基础;通过深入的文化情景体验能够深刻理解其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涵,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致力于提升文化认同感、自豪感。

2.2.3 以校地互动发展为定向的交际场

场域理论将社会化约为一个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0]。场域概念的思考是基于关系的视角,不同位置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构型是场域概念的重要特征,且这种关系构型被赋予了对所有进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施加影响和作用^[11]。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可以认为是社会高度分化之后而生成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具有自身规律的空间,遵循着自身的逻辑运行。另外,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学校与民俗体育活动地域的融合场,其并非限定于学校空间或是某一区域内民俗体育空间,是突破各自场域物理上的界限进行的深度融合。这就需要与学校、地域的民俗体育发展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积极的、多维度的互动联系,如围绕学校民俗体育的本域、跨域的交往,围绕地域民俗体育的本域、跨域的交往。由于场域间行为主体的位置及其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则显得尤为重要。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能够为场域中各关系主体提供深度交际的平台,能够围绕民俗体育活动进行跨时空交往,重视其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其运行机制,共同协调、组织、实施为学生、民众服务的民俗体育活动,发挥各主体间

作用,积极开展促进民俗体育发展的动态的、生成性的实践探索^[11]。

3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建构的时代诉求

3.1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和底气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21]。《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22]。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质,蕴含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哲思与实践智慧,其具有推进文化交流互鉴、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提升国家文化自信以及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功能^[23]。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多元一体,广阔的地理空间、悠久的历史时间、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时空场景,只有在相应的场景中跨越空间、跨越时间、体验文化,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特质的深刻认识^[24]。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需要置于一定的时空场景中,通过个人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同频共振而收获理想硕果。学校是实施文化教育的重要场域,具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培养面向未来的新兴力量,为拓展文化传承发展的时空域界提供了更多可能。作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重要构成的民俗体育,以学校作为优质传承载体,能够突显我国学校体育健身性与文化性兼具的特色,且学校体育教育的计划性和可控性较好地弥补了民俗体育受制于客观因素而产生的继承、传播、发展的困难^[25]。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一个能够让行动主体深刻体验民俗体育文化特质与魅力的时空场景,有利于引导更多关系主体参与民俗体育的实践探索活动,促进其由民俗体育文化认同向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仰转化。

3.2 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联合发展探索的经验总结

深刻的文化自省使民俗体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联合发展的探索得到重视,其对二者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民俗体育与西方体育间“文化势差”的存在,导致民俗体

育实践受既定惯习的影响,而贯之“西化思维”,作以形式上的“嫁接”,导致活动形式僵化、文化本位缺失^[4]。部分学校民俗体育项目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政策文件要求、模仿他校或“依教定学”等片面认识,以赛事多、知名度高等为主要依据,没有立足当前学校、地方实际对民俗体育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利用,呈现盲目化、功利化、局限化等现象。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达载体,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4,26],对活动主体动作技能、文化意识以及文化认同的要求较高。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多数主体奔走他乡,加之受到多元文化冲击,文化传播空间不断被压缩,从场域角度来看,民俗体育文化场各构成间的关系逐渐被弱化,场域能量处于“耗散”状态。以舞龙项目为例,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舞龙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内在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学校场域过度强调运动技能的表现,师生对动作意义表达的理解不透、不深,以活动内容与形式上的模仿为主,文化归属感缺乏,会导致其在与源自西方主流体育项目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此可见,文化场域的割裂、本位文化场的缺乏、外部文化场的冲击与干扰以及内外部信息交换不畅等现实问题反映了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互动实践之“浅”。若将民俗体育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中剥离并机械移植于新环境,差异化的文化土壤难以满足其生长与发展的需求,为此需要多方主体在不断地交流中科学配制适应其生长与发展的“新养分”。

3.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国际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2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2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民俗体育的发展必然依据这一要求进行创新性实践。人的现代性转化和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本质均是一种文化的“寻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

间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29]。中华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育文化共同体重要源泉^[30]。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从思想基础、物质条件、价值取向、制度保障四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1]。同理之,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建构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必然要求,是以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为使命的场域,积极创设以文“化”人的环境,通过发挥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优势加强学校体育与地方民俗体育各关系主体的互动与交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项活动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进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意识。以龙舟、舞龙运动为例,其作为龙文化的延伸,蕴含着“龙的传人”的文化底蕴,不仅激发了国内民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精神共鸣,取得了较高的文化认同和体育认同,还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较好的文化声誉和体育响应^[32],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4 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建构路径

4.1 加强民俗体育文化宣传创新,提高参与意识与能力

民俗体育具有较强烈的民族色彩与民俗气息,各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技能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俗体育表现形式,不同区域其表现状况的差别和差距长期存在^[33]。民俗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在体现其多样性、亲民性、民俗性等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其不易移植、推广难度大等劣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的空间。这不仅对民俗体育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对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此,其需要在深入认识受众媒介接触与传播效果间重要关系的基础上^[34],加强宣传途径创新,提高宣传效率,扩大民俗体育影响力,让广大群众认识到民俗体育的特征与价值,同时,吸引更多愿意为民俗体育发展出谋划策的有

志之士加入,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组织与实施能力,为民俗体育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力。

基于此,主要建议有:一是围绕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方面开展服务于重要关系主体的多样化宣传活动,使其充分认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高参与意识,激发各主体的实践潜力,如组织与开展民俗体育知识讲座、项目技能培训、成果展示与项目竞赛等活动。二是通过各类活动的有效开展展现对其他场域文化辐射的作用,扩大民俗体育文化影响的范围,吸引更多群体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实践,如推进民俗体育与其他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多方位合作,并以特色活动激活发展生态链,助力相关旅游、大众健身、器材制造等产业发展,扩大曝光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民俗体育实践活动。

4.2 优化民俗体育教学文化场,强化文化育人

学校是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建构的重要载体,能够发挥民俗体育文化服务未来人才培养的功能与价值,以优质资源反哺社会发展。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优化民俗体育教学文化场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面对学校体育教学实践中依然存在以“学科教育为中心”的误区、教学自信力消解等问题^[35],教学中存在忽视民俗体育固有文化生态的处理方式,将其剥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其失去了精神依托,致使缺少文化内涵的民俗体育进入华而不实的实践误区;文化教育的缺失及源自西方的现代体育文化的盛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民俗文化陌生、对民俗体育活动实践动力不足等问题,迫切要求优化校地民俗体育教学文化场,提升文化认同感,实现文化“育人”功能。

基于此,主要建议有:一是建强师资队伍,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建设中承担着主导性的工作。通过招聘民俗体育专业教师、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以及聘请传承人等方式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以教师自主教学与传承人指导性教学相结合的模式^[36],如积极引导师生围绕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方向进行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组织专业教师就运动项目的教学、训练、展演以及比赛等方面工作进行交流、研

讨,鼓励教师申报各类课题、撰写科研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针对传承人要强化学科自觉意识,助其超越经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所处的生存环境,进而更好地融入学科建设队伍^[37]。值得一提的是,教学是一项良心活,教师应当树立教学良心,重视教学,强调教书育人^[38],特别在源自西方的现代体育文化强烈冲击下,就民俗体育的传承发展,教师更有一定危机意识与紧迫感,提升自身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二是深入挖掘与利用民俗体育项目资源,高效达成育人目标。运动项目是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载体,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应当重视运动项目的选择,从学校体育总体发展的需要、学校地域特征、教师团队特长、学生的先前经验与兴趣以及项目健身性、娱乐性、观赏性、推广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选择最佳的民俗体育项目组织开展,并能够根据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建设的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以使其保持不断优化发展、充满活力的状态。由于民俗体育项目的开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根据地方区域特色、项目生长与发展的空间以及学校主体的特征,针对性地进行民俗体育教学内容资源的整合,着重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获得感,提高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教育合力。

4.3 拓展民俗体育课外活动文化场,增加交流与体验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是体育课堂教学的补充与拓展,是促进体育融入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校地贯通不可或缺的途径。民俗体育课外活动文化场是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构建的重要内容,其要求加强活动内容、活动空间、活动形式以及活动主体身份等方面的拓展,充分展现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交际性特征。通过深入分析民俗体育项目区域“文化场”特征,发挥优秀民俗体育文化的优势,积极搭建校地交流合作平台,以“引进来,走出去”理念开展课外民俗体育活动,创造更多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让校地行动主体在情境中感知、体悟,为创新性的传承积聚力量,即从内容迁移、形式模仿到内涵的融合。

基于此,主要建议有:一是将特色民俗体育项目“引进来”,为增强学生认知与体验创造更多的机

会,如将舞龙、舞狮等特色民俗体育项目作为校园特色活动,在学校定期举办的校园文化节、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各类活动中作为“常设”项目。二是让创新融合的校地民俗体育文化“走出去”,积极与外界互动,如深入特色民俗体育文化场域,在互动中明晰实践方向,激活创新思维,为更好地继承与弘扬积聚能量。学校积极组建宣传队、表演队、参赛队等,参加各类型展演、比赛活动,注重民俗节事活动空间的拓展,在切身感受优秀民俗体育文化氛围的同时,为周边地域的民众送上文化服务,对因城市化发展造成主体流失的地域民俗体育活动引入“外援”,让民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民俗体育文化氛围,推动传统文化在民众中的传播。参与主体在各类展演、交流活动中,加强与其他特色文化的交流,激活并提升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能力,为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4.4 深化多元互动机制,重视关系主体“在场性”

文化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完备的保障体系持续提供动力,多方齐心协力、主体“在场”则是重要条件。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是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互动体系构建的内在特质,是多方行为主体相互间发生联系的综合场,各主体存在着积极的行为模式,从显性和隐性层面均产生交互性的影响,其包括场域中的互动、场域与外部的跨区域合作。跨区域合作主要突破的是形式上的边界,而场域融合不仅要求破除场域物理界限,更重要的是重塑有活力、有能量的关系网络,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具有更强力量的综合场,充分发挥场域行为主体能动作用。

基于此,主要建议有:一是建立校地民俗体育发展支持服务中心,加强政府、学校、企业、社区等多元合作,为民俗体育传承发展提供制度、经费、人力以及技术等支持,保障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高效运行,如通过与信息技术企业的合作,以技术赋能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39]。二是加强关系主体的交流合作,展现新型关系主体的优势。管理部门、信息传递者以及受众等是场域的重要关系主体,各项活动的开展需要其在协调内外关系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并能够依据既定的运行规则进行

合理化的协作实践。通过多维的互动合作,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展现“在场性”作用。“在场性”是对主体能够立足场域,从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实践而提出的要求,其应体现在主体实践与本体需要的两个层面。从主体实践来看,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构建的状态是管理部门、传播者以及受众等共同“在场”状态的反映,其依据场域活动要求对“在场”主体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如在学校民俗体育教学场中,根据学生发展与民俗体育传承的目的,组织管理部门、教师、学生以及地域民俗体育各关系主体等进行积极的合作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能动地展现各自对教学实践的积极影响,其包括主体“在场”、实践行动与目的“在场”。从民俗体育本体需要来看,各项活动应当围绕其优秀特征与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同时适应文化主体不同时代的生活需要,满足时代要求而进行适应性改造^[40]。结合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实践经验,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对于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可以采用综合化的传承路径^[41],如将核心内容与形式进行保留,根据功能提升与转化需要进行适当性改造,提升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拓展传承主体。换言之,校地民俗体育文化场的实践载体应是与民俗体育相关联的文化活动,不局限于单一式的项目,也包括与其他体育项目共同“在场”的综合活动,但应注重保持根本性“在场”的状态,对于为迎合“他者”,仅以形式上的模仿、内容上的简单复制而进行“切割式”的伪活动,是脱离民俗体育文化内在精神的,是本体“离场”的体现,其将不利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

作者贡献声明:

卜宏波:提出研究选题、案例分析、撰写与修改论文;
王树明:指导论文修改、校对论文。

参 考 文 献

- [1] 钟秉枢,李楠.体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基本理念与具体路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34(1):1-7.
- [2] 雷军蓉,王世友.本土异域间: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本土化”研究的审视与论绎[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133-139.

- [3] 崔涛,张波,周坤,等. 传承传统文化视野下校园民俗体育发展路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1): 94-99.
- [4] 王斌,朱杰,朱坚,等. 文化生态视域下民俗体育运动在高校发展的困境及破解之道[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11): 126-130.
- [5] 朱罗敬,汤立许,肖丽,等. 校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再优化研究——基于临江市两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传承实践比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6(5): 600-607.
- [6] 徐英微,孙韬. 原生态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6): 153-155.
- [7] 张华江,李萍,王建宏. 文化自信与文脉赓续: 民俗传统体育文化融入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探析[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1(5): 58-62.
- [8] 王智慧. 文脉赓续与民族复兴: 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传递与文化自觉——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文化自信论的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6(1): 1-9.
- [9] 侯志涛,周宇轩,韦晓康.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变迁和实践选择[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10): 51-57.
- [10] 张庆如. 体育场域空间何以生成?——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意义及其限度[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3): 16-20.
- [11] 杨岭. 大学教学文化场的内涵与建构路径[J]. 教育评论, 2017(9): 8-13.
- [12] 周丽华,唐强. 自主与同构: 场域理论视阈下湘西苗族传统体育的特征与发展机制[J]. 武术研究, 2021, 6(10): 110-113.
- [13] 刘宗南. 论课程场域[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3(5): 64-69.
- [14] WACQUANT L J D.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1): 26-63.
- [15] 宫留记.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7-51.
- [16] 李全生.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 146-150.
- [17] 崔海亮. 华夷观、天下观与民族观——中国哲学史书写中的少数民族哲学问题[J]. 青海民族研究, 2018, 29(4): 16-20.
- [18] 王学典. 江山胜迹我辈登临——谈中国历史传承中的文化基因[N]. 光明日报, 2020-10-21(11).
- [19] 熊欢. 从身体实践到“他者”的时空——《时间与他者》对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启示[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6): 138-142.
- [20]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34.
- [21] 韩玉胜.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J]. 中华文化论坛, 2017(11): 51-57.
- [2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7(6): 18-23.
- [23] 马秀杰,唐双双. 新时代新征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价值意蕴、遵循原则与实践路径[J]. 体育科学, 2023, 43(6): 13-20.
- [24] 钟晟,欧阳婷. 旅游是一种唤醒文化自觉的成长方式[N]. 中国旅游报, 2021-04-21(3).
- [25] 张弘苗. 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 35(10): 92-95.
- [26] 杨昆普. 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40(4): 39-41.
- [27] 钟晟. 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J]. 江汉论坛, 2022(3): 139-144.
- [28]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N]. 人民日报, 2021-11-08(12).
- [29] 徐德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 光明日报, 2017-04-10(15).
- [30] 金宁,张铁明.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2): 164-169.
- [31] 彭响,刘如,张继生. 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54(2): 59-64.
- [32] 吴艳红,王广虎. 文化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5(5): 58-63.
- [33] 冯宏伟. 新时代农村地区民俗体育的发展: 形式、局限与路径[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10): 125-132.
- [34] 辛双双,马秀杰. 海外受众媒介接触行为对武术文化传播效果影响的实证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2024, 50(2): 59 – 66.
- [35] 卜宏波, 姚磊, 汪健. 后疫情时代大学体育教学的现实反思与实践进路[J]. 巢湖学院学报, 2020, 22(6): 137 – 143.
- [36] 文汇. 高中音乐课程中渗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以川江号子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S2): 14 – 18.
- [37] 万建中. 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主体[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3): 75 – 81.
- [38] 韩延明, 张洪高. 我国大学教学文化建设探析[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2): 105 – 111.
- [39] 卜宏波, 王树明. 文化与技术: 双重赋能视域下高校民俗体育发展审思[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23, 22(10): 49 – 54.
- [40] 刘合智.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失位的思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5(4): 54 – 59.
- [41] 涂传飞. 对一项村际传统龙舟赛国家化实践的人类学考察[J]. 体育科学, 2021, 41(6): 29 – 41.

School-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Field: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Demand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BU Hongbo^{1,2,3}, WANG Shuming¹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choo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 bridge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folk sports. Based on the revelation of school folk sports practi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chool-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field” according to the field theory, which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is constructed by crossing the cultural situation and time-space boundarie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folk sports reg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subject carries out folk sports culture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asonable practical logic and operating rules. The school-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field is a practice field with folk sports activities as the carrier, a spiritual field with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identity as the core, and a communication field oriented by school and local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experience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folk sports, and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t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paths to construct the school-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field: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propaganda and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ptimizing the cultural field of folk sports teaching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ducation; expanding the cultural field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folk sports,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 deepening the multipl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nd emphasizing the “presence” of relational subjects.

Key words: folk sport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local integ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confidence; field theory

CLC number: G80-05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1 – 9154(2026)06 – 0048 – 09

责任编辑 马杰华

责任校对 任 丹